

决不许重演张国焘的反党故伎

——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一点体会

李 仲 英

张国焘，出身北大学生，白面书生，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更不会打仗。他不懂马列，也不接触实际，是个典型的没有经过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九二一年投机革命，一九二五年就当叛徒。这个大叛徒混入革命队伍，一贯推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干尽了从内部破坏革命的勾当，造成极大的罪恶。其最著者，是一九三五年反对红军北上，大搞分裂主义，自立伪中央，公然进行反党活动，使红军第四方面军蒙受了重大损失。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同张国焘的反党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对这场斗争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今天，在揭露和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重温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正是张国焘反党故伎的重演。

毛主席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是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的标志。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转战滇黔，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同年六月，翻越了川康边境的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到陕甘宁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但是，当时窃居红四方面军领导职务的张国焘却公然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党活动。他主张红军向康藏边界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当即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严厉斥责。毛儿盖会议后，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但张国焘自恃掌握了一部分兵权，又大搞军阀主义，妄图以“武力解决”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指挥的右路军，危害毛主席和党中央。但是，由于当时在左路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及时报告了毛主席，他的阴谋未能得逞。此后，张国焘便公开打出反党黑

旗，在绰木碛另立“中央”，自封“主席”，反党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不但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严厉谴责，而且遭到了左路军中的朱德、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几个月后到达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的二方面军中的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反对。经过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同意和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但是，在北上过程中，张国焘又大耍阴谋，假借中央名义，欺骗两万多红军战士西渡黄河，进军青海，结果因路线错误，遭到惨败。剩下不到一千人，由李先念同志带领，到达新疆；后来，毛主席又派人把他们接回到陕北。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今天，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不是又在重演张国焘的反党故伎吗？他们完全背叛了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卑劣手法，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篡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投降帝国主义。他们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一九七四年十月，他们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告周总理的状，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这个阴谋遭到毛主席的痛斥后，他们还贼心不死。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又托人向毛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们的阴谋，指出：“江青有野心。他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他自己作党的主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利令智昏，认为时机已到，高兴得手舞足蹈。不仅骑马兜风，长城打猎，而且加快了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步伐。他们利用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当华国锋同志指出毛主席的亲笔指示是“照过去方针办”，揭穿了他们的伪造时，他们又老羞成怒，在《光明日报》发表反党文章，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我们敬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他们在这篇反党黑文中，给华国锋主席戴上三顶帽子，进行了无耻的攻击和诬蔑，什么“篡改”呀，什么“背叛”呀，什么“修正主义头子，绝然没有好下场”呀！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妄图推翻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又是照“标准像”，又是准备“政治报告”，似乎万事俱备，只待“龙袍”加身了。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在十年前就警告过他们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他们人心丧尽，国人皆曰可杀，反共政变还没有搞成，就被革命人民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有什么样的组织路线。张

张国焘为了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野心，推行一条反革命的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张国焘以“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来对抗毛主席“任人唯贤”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妄图以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我们的党。在党的生活上，张国焘是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起来。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党的思想教育与自我批评。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期间，排斥打击老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大搞肃反扩大化，被他打击迫害的干部达百分之七十。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干部政策，毛主席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

但是，这个大教训并不为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所吸取。他们另搞一套，自命为“无产阶级钢铁公司”，在党内自成体系，抱成一团，为所欲为，称王称霸，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私自召开十几个省的会议，在会议上胡乱点名，甚至切断一些省市同中央的联系，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他们一方面开设“帽子工厂”，大搞整人哲学，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党阀”、“大军阀”、“修正主义头子”、“邓记谣言公司分店”、“民主派”……等等政治帽子满天飞；另一方面用封官许愿、吃喝玩乐、吹吹拍拍等无耻手段，腐蚀和拉拢一部分人为他们卖命。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事实证明，他们在搞宗派方面，不但无愧为张国焘的高足弟子，而且正如他们以“初澜”作为笔名所表明的那样，简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毛主席指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事实证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一些顽固派，要他们改也难。红军一方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先后在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上，多次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斗争，对其本人进行了耐心地批评和教育，并让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希望他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但是，张国焘却采取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表面上痛哭流涕，承认错误，并几次声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实际上却在准备最后公开叛党。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借口去陕西中部参加祭黄帝陵的仪式，先后跑到西安、武汉，只身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抱，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四人帮”反党集团也是张国焘之类的顽固派。对于他们的反党行为，毛主席早就有所察觉，一再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批评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又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再次警告他们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但是，

他们对于毛主席的批评和警告，也象张国焘一样，采取了不能容忍的两面派态度：表面上说“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地里却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堕落成为千古罪人。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个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锻炼和培育的党，不愧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历史经验也证明，一切坚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玩弄阴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过去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十次搞分裂，十次都失败；这次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同样遭到了身败名裂，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我们党对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党对“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逝世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给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以“三要三不要”的三项基本原则来识别党内资产阶级，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任何人如果敢于重演张国焘的反党故伎，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上接第87页）

相同的手法。社会是发展的，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的终将代替旧的，革命的阶级终将打倒垂死的阶级。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垂死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可以疯狂于一时，最后必然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所以，她同白骨精会得到同样可耻的下场。

所有这些，已足以说明江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骨精了。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上引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在无产阶级革命风雷激荡的历史时期，出现白骨精江青不足为奇，这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但是，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推向前进，彻底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对“白骨精”做点小小的探索，是很有必要的。